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

——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刘长庚 王宇航 彭千芮

摘要: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扫黑除恶;居民福利;黑恶势力;生活满意度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3.03.008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①。可见,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已经成为党执政理念的核心,同时也成为政府政策制定和评价的重要依据。在经济学研究中,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是居民福利水平的主要指标,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居民收入、消费、创业等个人经济行为^{②③④},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空气污染等外部环境因素^{⑤⑥⑦},以及子女数量、家庭关系、社会资本等家庭和社会因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新时期的对策研究”(18ZDA06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保障安全网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作用机制研究”(21CJL017)。

作者简介: 刘长庚,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校长,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 410205; liugeng@xtu.edu.cn);王宇航,湘潭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湘潭 411105; 1223250785@qq.com);彭千芮,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长沙 410205; pengqianrui@126.com)。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② La B. T., Lim S., Cameron M. P., et al., “Absolute Income, Compariso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 Transitional Country: Panel Evidence from Vietnamese Household Surveys”,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1, 72, pp.368-385.

③ 胡荣华、孙计领:《消费能使我们幸福吗》,《统计研究》2015年第12期。

④ 周烁、金星晔、伏霖等:《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居民创业行为: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世界经济》2020年第3期。

⑤ 谢罗奇、王宇航、赵纯凯:《包容性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6期。

⑥ 程名望、华汉阳:《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2期。

⑦ Sandujav C., Ferreira S., Filipski M., et al., “Air Pollution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the Coldest Capital in the World”,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1, 187(3), 107085.

素^{①②③}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居民福利的因素中,社会治理被认为是重要的方面。其中,鲁元平和王韬研究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会造成社会犯罪率增加,降低居民福利水平^④。陈刚和李树证明,官员腐败会显著降低居民幸福感^⑤。相应地,反腐败行动也会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⑥。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扫黑除恶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安全治理,提出要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在全局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2018年以来,全国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14.9万人,起诉23万人,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5.4万人,起诉涉黑涉恶“保护伞”2987人,为居民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0年下半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98.4%,有95.7%的群众对专项斗争成效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⑦。可见,打击黑恶势力对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但现阶段尚未有文献就扫黑除恶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展开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利用CFPS2016年度调查数据,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视角,通过检验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反向识别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考察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对福利经济学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展。现有文献已经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因素,但尚未有学者从社会治理角度分析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第二,扫黑除恶是党中央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旨在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本文通过检验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识别扫黑除恶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供了经验支持。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黑恶势力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较低地区、法治基础薄弱地区和公共安全支出较低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负效应更大,给农村居民、低收入居民和低学历居民造成的福利损失更严重。这一结果明确了当前扫黑除恶的工作重点,为建立扫黑除恶长效机制提供了经验指导。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为保证正常的生活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党中央多次开展针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行动。1983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示公安部,要求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⑧。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从严从重打击社会刑事犯罪的序幕。2001年4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斗争,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

① 穆峥、谢宇:《生育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② 陶涛、李丁:《夫妻职业相对地位与家庭幸福感关系研究》,《人口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李平、朱国军:《社会资本、身份特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居民社会网络变迁的视角》,《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

④ 鲁元平、王韬:《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

⑤ 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

⑥ 柳建坤:《“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民众的幸福感——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治理研究》2019年第1期。

⑦ 上述内容可参见《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部署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100007/2021-03/30/content_12468913.shtml,访问日期:2023年3月25日。

⑧ 参见《刘复之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55页。

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①。2010年,公安部针对当时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动员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为期7个月的严打整治行动,提出要严厉打击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活动^②。经历多次“严打”斗争后,虽然黑恶势力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在总体上仍然存在“打击就沉,不打就起”的态势。

2018年1月,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到工作全局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针对涉黑涉恶问题新动向,提出要切实把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2020年4月,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提出要深入开展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件清结、伞网清除、黑财清底和行业清源等“六清”行动,确保依法打深打透、除恶务尽,夺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③。截至2020年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是前10年总和的1.3倍,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全国法院的一审审结涉黑恶案件32943件,225495人,其中53405名涉黑恶案件被告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89742件,立案处理115913人^④。与多次“严打”相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及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受到重视程度更高、取得的成绩更大。通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彻底打击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黑恶势力得到根本遏制,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使得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二)理论假说

良好的公共安全治理有助于弘扬社会公正主旋律,强化个人安全,构建社会信任,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提升居民安全感和幸福感。通过对黑恶势力相关特征的分析,本文认为黑恶势力犯罪可能通过以下途径降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第一,黑恶势力阻碍了居民经济价值实现。从中央对社会黑恶势力经济行为的认定标准来看,黑恶势力主要通过抢占资源、强揽工程、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以商养恶、以恶护商等方式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使部分资源的配置方式从市场转向暴力和强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错配,降低了经济增长潜力。另外,对外在经济社会变迁及其环境的风险把控和安全感知会形成人的主观安全感和社会信任,这种普遍的社会信任又构成了整个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基础。何明钦和刘向东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的公共治理信任与消费需求密切相关,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信任能够提高居民消费总量并促进消费升级^⑤。与社会治理信任相悖,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活动对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破坏,可能降低居民的安全感和社会信任,进而抑制居民消费需求^⑥。同时,黑恶势力常常以管理费、卫生费等名义,向经营业主强行摊派或收取费用,实施敲诈勒索,并以暴力方式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排挤他人进入本地市场,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增大了居民从事创业活动的成本和风险,使居民通过创业提升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路径受阻。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黑恶势力活动带来的负效应,可能阻碍居民

①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检察机关积极投入第三次“严打”整治斗争》,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3382797218750233&wfr=spider&for=pc>, 访问日期:2023年3月27日。

② 《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2010严打整治行动”》, http://www.gov.cn/gzdt/2010-06/13/content_1627471.htm, 访问日期:2023年3月25日。

③ 《扫黑除恶“六清”行动是什么?》,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8233202, 访问日期:2023年3月25日。

④ 《雷霆亮剑——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纪实》,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28/content_5596414.htm, 访问日期:2023年3月25日。

⑤ 何明钦、刘向东:《社会信任心理与消费行为——基于总量和层次的机制研究》,《消费经济》2020年第1期。

⑥ Dustmann C., Fasani F., “The Effect of Local Area Crime on Mental Health”,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6, 126(593), pp.978-1017.

的经济价值实现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造成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

假说1:黑恶势力可能通过限制居民创业行为和收入增长,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

第二,黑恶势力降低了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除物质条件外,发展预期、公平感和心理健康等心理因素也是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居民当前的情感状态。其中,积极的心理预期会增强居民生活满意度,消极的心理预期会恶化居民的福利状态。李磊和刘斌发现,居民对未来收入、资产、职位和工作条件的良好预期都能够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①。黑恶势力作为对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地区经济活力,减少居民就业和创业机会,降低居民对自身经济条件的预期。同时,黑恶势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可能造成社会公平正义缺位,阻塞居民向上发展的渠道,降低居民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心理预期,进而阻碍居民福利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是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直接因素。研究表明,地区犯罪活动会降低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尤其对低收入和女性等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更是如此^②。Dustmann和Fasani研究发现,在犯罪率高的地区,居民长期处于一种压抑、恐惧的情绪中,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③。Hessel等人发现,社区犯罪活动会显著增加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概率^④。从黑恶势力的外在特征来看,暴力犯罪是黑恶势力活动的主要形式,包括有组织地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组织容留妇女卖淫等,这些犯罪活动给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长期生活在黑恶势力犯罪较为活跃的地区,会威胁居民的心理健康,降低生活满意度。

假说2:黑恶势力可能通过降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

第三,黑恶势力恶化了区域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社会治安和政府治理绩效是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外在条件。鲁元平和王韬发现,社会犯罪率上升会降低居民主观福利水平^⑤。Helliwell和Aknin认为,安全感是居民福利水平衡量的重要内容,公共安全治理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⑥。与公共安全的要求相悖,黑恶势力活动往往存在暴力、威胁、欺压等外在特征,具有很强的强迫性。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绩单来看,2020年全国刑事案件比2017年下降了13.1%,八类严重暴力案件下降了30%^⑦。可见,扫黑除恶能够通过改善社会治安环境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另外,政府治理是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保障,廉洁、公开、公正、高效的政府治理过程,以及对民生、环境和社会治安的重视能够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⑧。然而,黑恶势力活动背后往往有政府官员的身影,其行为包括收受不法分子贿赂,利用手中权力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等。上述行为往往伴随着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下降、腐败严重、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社会治安混乱等诸多问题,造成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

假说3:黑恶势力可能通过恶化区域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

① 李磊、刘斌:《预期对我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② Whitley R., Prince M., "Fear of Crime, Mobil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Inner-city London, U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 61(8), pp.1678-1688.

③ Dustmann C., Fasani F., "The Effect of Local Area Crime on Mental Health",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6, 126(593), pp.978-1017.

④ Hessel P., Botero M., Cuartas J., "Acute Exposure to Violent Neighborhood Crim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Individuals in Colombia", *Health & Place*, 2019, 59.

⑤ 鲁元平、王韬:《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

⑥ Helliwell J. F., Aknin L. B., "Expanding the Social Science of Happines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18, 2(4), pp.248-252.

⑦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成绩单公布:答卷里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三大密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731002310411457&wfr=spider&for=pc>, 访问日期:2023年3月25日。

⑧ 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

三、实证思路、数据来源、变量释义与模型设计

(一)实证思路

本文旨在通过检验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测度扫黑除恶的社会福利效应。一般而言,政策效应识别往往使用双重差分等自然实验方法。但由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发生在2018年1月到2020年12月,当前尚缺少在政策发生之后的微观调查数据,使得这一方法不适用于本文研究。在此,本文借鉴柳建坤的研究思路^①,使用扫黑除恶政策实施后被惩治的黑恶势力数量作为政策实施前地区黑恶势力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通过检验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来反向评估扫黑除恶的社会福利效应,而该方案成立的关键条件在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惩治的黑恶势力与政策实施前社会存在的黑恶势力基本一致。从对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背景、历程和成果的梳理来看:一方面扫黑除恶对社会黑恶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能够有效抑制政策实施期间黑恶势力组织的形成和犯罪活动的发生;另一方面,从扫黑除恶的政策力度、涉及范围和案件追溯的历史长度来看,为期三年的专项行动能够识别并处理过去较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黑恶势力。因此,本文以扫黑除恶三年专项行动取得的成绩作为政策实施前黑恶势力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反向考察扫黑除恶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思路具有合理性。

(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CFPS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覆盖除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和台湾之外的25个省市区,能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的发展和变迁,运用CFPS数据研究黑恶势力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具有全国代表性。考虑到本文实证思路是使用扫黑除恶三年专项行动起诉的黑恶势力数据作为专项行动前各省份黑恶势力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检验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了降低时间间隔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被解释变量的选取要求在时间上足够接近扫黑除恶三年专项行动,但不能受到三年专项行动的影响。由于三年专项行动开始于2018年1月,在较近的时间范围内仅2017年CGSS调查数据和2016年CFPS调查数据涉及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并且2017年CGSS数据缺少本文机制检验所需的相关变量。综上所述,本文选择CFPS2016年度数据作为实证样本更为恰当。

(三)变量释义^②

1. 解释变量。本文使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各省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涉黑涉恶犯罪人数与该省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地区黑恶势力的严重程度。其原因在于,从事件性质来看,涉黑涉恶活动在本质上是有组织的非法犯罪活动,与之相近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官员腐败对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的影响研究。其中,Glaeser和Saks使用美国各州公务员中被判定腐败罪人数占全州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该州的腐败情况^③。周黎安和陶婧使用各省国家机关腐败立案数来衡量地区腐败程度^④。聂辉华等使用了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来衡量地区腐败程度^⑤。另一类是刑事犯罪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究。鲁元平和王韬使用各省刑事案件发生率来表示犯罪率^⑥。章元等使用每万人中刑事犯罪数和每万人中被刑事起诉人数来衡量地区犯罪率^⑦。石庆玲和郭峰使用每10万人口中检察院批

① 柳建坤:“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民众的幸福感知——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治理研究》2019年第1期。

② 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不作展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③ Glaeser E. L., Saks R. E., “Corruption in Ame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6, 90(6-7), pp.1053-1072.

④ 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聂辉华、张彧、江艇:《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5期。

⑥ 鲁元平、王韬:《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知——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

⑦ 章元、刘时菁、刘亮:《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准逮捕数和每10万人口中检察院提起公诉数来衡量犯罪率^①。从文献来看,使用上述做法衡量各省黑恶势力程度都具有合理性。从数据的可得性来看,为配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018年到2020年各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开始单独列出当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成效,报告内容涉及处理案件数、批捕人数和起诉人数等,其中起诉人数信息统计最为完整,且三年取得的成效总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事前该地区黑恶势力的严重程度。按照前文实证思路,借鉴章元等的做法^②,本文使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各省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涉黑涉恶犯罪人数与该省总人口均值的比值(每万人中被起诉的涉黑涉恶人数)来衡量地区黑恶势力严重程度。

2. 被解释变量。居民生活满意度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中“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的回答来衡量,分值从1到5分别定义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为了识别本文黑恶势力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绘制了黑恶势力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图。由图1结果可见,地区黑恶势力严重程度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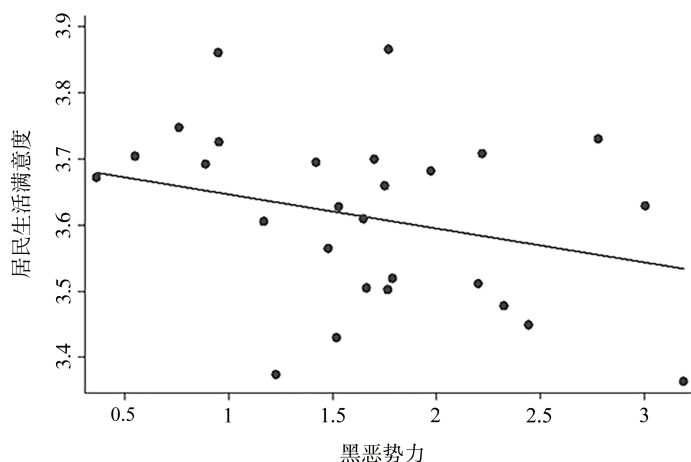


图1 黑恶势力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

3. 控制变量。除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按照一般做法,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居民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户口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相对收入、是否为中共党员、有无宗教信仰、是否工作、是否在体制内工作^③等个体因素,同时也加入了是否有房产、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资产^④等家庭层面变量。

(四)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居民生活满意度为取值1—5的有序离散型变量,本文建立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基准方程可表示为:

$$Satisfaction_{ihs}^* = \alpha_0 + \alpha_1 Gcr_s + \alpha_2 D_{ih} + \mu_{ihs} \quad (1)$$

其中,下标*i*表示个人,下标*h*表示家庭,下标*s*为省份,*Satisfaction*^{*}表示潜在的居民生活满意度,*Gcr*表示居民所在省份黑恶势力,*D*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 表示随之扰动项。

Satisfaction^{*}表示潜在的居民生活满意度,其与我们可观测的有序数列 *Satisfaction* 具有如下

① 石庆玲、郭峰:《高房价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② 章元、刘时菁、刘亮:《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将居民是否在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视为体制内工作的代理变量,若是则为1,否则为0。
 ④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对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等连续变量1%和99%分位数以外的数据进行缩尾处理。

关系：

$$\begin{aligned}
 Satisfaction &= 1, \text{ 如果 } Satisfaction^* \leq r_1 \\
 Satisfaction &= 2, \text{ 如果 } r_1 < Satisfaction^* \leq r_2 \\
 Satisfaction &= 3, \text{ 如果 } r_2 < Satisfaction^* \leq r_3 \\
 Satisfaction &= 4, \text{ 如果 } r_3 < Satisfaction^* \leq r_4 \\
 Satisfaction &= 5, \text{ 如果 } Satisfaction^* > r_4
 \end{aligned}
 \tag{2}$$

在有序 Probit 模型中,如果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是相互独立的,那么采用极大似然法(ML)估计方程就能够得到回归系数的一致估计量。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1是基于有序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汇报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回归的估计系数,估计结果显示黑恶势力能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列(2)一(6)汇报了居民生活满意度分别为1到5时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表明黑恶势力能使居民较低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1、2、3)的概率上升,较高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4、5)的概率下降。从经济学含义来看,列(2)一(6)的结果表示,每万人中涉黑涉恶人数每增加1人,居民对自身生活感到“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0.08%、0.13%和0.19%,居民对自身生活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0.08%和0.32%。

表1 基准回归

	(1)	(2)	(3)	(4)	(5)	(6)
	回归系数	满意度=1 边际效应	满意度=2 边际效应	满意度=3 边际效应	满意度=4 边际效应	满意度=5 边际效应
黑恶势力	-0.0107** (-0.0046)	0.0008** (0.0003)	0.0013** (0.0006)	0.0019** (0.0008)	-0.0008** (-0.0003)	-0.0032** (-0.00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0072	30072	30072	30072	30072	30072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或边际效应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①

1. 剔除干扰样本的稳健性检验。(1)考虑到学生群体对黑恶势力带来的负效应可能感受不深,样本中包含学生群体可能低估黑恶势力活动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负效应,对此本文使用剔除在校学生的样本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2)考虑到部分失能群体生活自理能力较差,且长期脱离社会活动,缺少对当前社会的了解,同时,失能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可能更多受自身健康状况的影响,对黑恶势力带来的社会负效应敏感度较低^②,对此本文使用剔除失能居民的调查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3)考虑到黑恶势力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居民搬迁行为可能会降低估计精度,因此本文使用剔除2014—2016年调查期间发生异地搬迁的家庭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4)考虑到若在扫黑除恶政策实施前部分省已经实施类似的政策,则本文基础回归结果可能低估扫黑除恶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此本文使用

① 该实证结果限于篇幅不作展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② 本文以居民能否独立进行户外活动、独立进餐为标准判断其生活自理能力,若不能独立进行户外活动或独立进餐,则定义为失能个体,否则不是。

剔除事前实施类似政策样本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①。估计结果显示,剔除在校学生、失能居民、搬迁家庭和事前实施类似政策省份等干扰样本之后,上述结果依旧稳健。

2. 考虑聚类问题的影响。受同一地区、同一文化环境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在居民生活满意度方面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为排除这一影响,本文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聚类到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来减少聚类层级带来的估计偏差,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依旧稳健。

3. 更换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使用CGSS2017年度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显示,虽然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差异较大,但在统计上表现出良好的显著性,表明黑恶势力确实降低了居民生活满意度。

(三)内生性处理^②

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1. 多角度构建衡量地区黑恶势力的代理变量。本文分别使用扫黑除恶三年专项行动被起诉的涉黑涉恶人数(万人)与所有被起诉人员(万人)的比值作为地区黑恶势力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相应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排除变量潜在测量误差的条件下上述结论依旧稳健。同时,考虑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时间间隔对回归结果带来的潜在偏差,本文使用2016年各省百度搜索“黑恶势力”“黑社会”等关键词的搜索指数作为该省2016年黑恶势力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检验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2016年黑恶势力显著降低了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可见,在排除时间因素的干扰后,本文结果依旧稳健可靠。

2. 控制潜在遗漏变量问题。为了更好地缓解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偏差,本文在已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地区黑恶势力和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变量,包括居民对中国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政府腐败等外在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价,以及消费水平、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等宏观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潜在遗漏变量的条件下,上述结论依旧稳健。

3. 工具变量法处理。本文借鉴陈硕的实证方法^③,使用2018年前各省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作为工具变量。研究表明,在同等条件下,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越高,其相应的谈判权越大,为本部门争取的资源就越多。地区社会治安和司法部门投入越多,意味着该地区有更好的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更强的执法能力和更高效的司法体系,能够对犯罪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和打击能力,降低社会犯罪率。因此,从相关性来看,2018年前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能够有效提升该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打击能力,降低黑恶势力的严重程度,使2018年前各省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与2018年后黑恶势力严重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从外生性来看,在控制省级层面经济和治安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政法委书记政治资历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文使用2018年前各省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④。考虑到居民生活满意度是一个有序离散变量,本文分别使用IV-2SLS模型和IV-o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在排除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估计结果依旧显著为负。

(四)机制检验

1. 黑恶势力阻碍了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首先,检验黑恶势力对居民家庭收入和家庭创业行为的

① 若该省份人民检察院2016年工作报告中在2016年工作总结或2017年工作安排中涉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等类似表述,则认为该省在专项行动前实施了类似政策,否则未实施类似政策。

② 该实证结果限于篇幅不作展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③ 陈硕:《转型期中国的犯罪治理政策:堵还是疏?》,《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2期。

④ 为了与实证数据保持一致,本文使用2016年各省政法委书记党龄作为其政治资历的代理变量。若2016年该省政法委书记未发生调整,则以当年在职政法委书记党龄作为其政治资历。若2016年该省政法委书记发生调整,则以当年两位政法委书记党龄的均值测度该省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

影响。表2列(2)和(3)的结果显示,黑恶势力对居民家庭收入和创业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黑恶势力确实阻碍了居民的经济价值实现。其次,将居民家庭收入和家庭创业行为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①,检验两者是否为黑恶势力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传导路径。由于基准回归中已经包含了家庭收入变量,因此使用不包含居民收入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列(4)的估计结果显示,创业行为能够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且降低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列(5)报告了不包含家庭收入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相比,剔除家庭收入变量后,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负效应显著增大。综上所述,黑恶势力确实能够通过限制居民创业和收入增长的路径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

表2 黑恶势力阻碍居民价值实现的传导机制检验

	(1) 居民生活满意度	(2) 家庭创业	(3) 家庭收入	(4) 居民生活满意度	(5) 居民生活满意度
黑恶势力	-0.0107** (-0.0046)	-0.1349*** (0.0164)	-0.0097*** (0.0009)	-0.0119 (0.0110)	-0.0129** (0.0052)
家庭创业				0.0426** (0.0179)	
家庭收入	0.0046*** (0.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0072	30078	30078	30072	30121

注:表中列(1)(4)(5)汇报了使用Oprobit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列(2)汇报了使用Probit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列(3)汇报了使用OLS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2. 黑恶势力降低了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在此,本文分别使用居民对未来的信心和消极情绪水平作为其对未来预期和心理健康的代理变量,通过检验黑恶势力对居民未来信心和消极情绪的影响,以及居民未来信心和消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识别上述传导机制^②。表3列(1)为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列(2)和(3)的估计结果表明,黑恶势力能够显著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激发居民的消极情绪。从列(4)和(5)的估计结果来看,居民对未来的信心能够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而消极情绪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且在基准回归中分别加入居民对未来的信心和消极情绪变量后,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负效应明显下降。可见,黑恶势力通过恶化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来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机制确实存在。

3. 黑恶势力会恶化区域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在此,本文通过检验黑恶势力对居民所在地区的治安水平和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③,以及地区治安水平和政府治理绩效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识别上述传导机制。从表4列(2)和(3)的估计结果来看,黑恶势力活动会降低居民所在地区的治

① 将从事个体经营或农业生产投入成本超过5万元的家庭定义为创业家庭,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参见湛泳、徐乐:《“互联网+”下的包容性金融与家庭创业决策》,《财经研究》2017年第9期。

② 本文用CFPS2016年度调查问卷中对“您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的回答来衡量对未来的信心,按照对未来信心由低到高分分别赋值为1-5。消极情绪测度使用调查问卷中对“下面是一些您可能有的感受或行为,请根据实际情况,指出在过去一周内各种感受或者行为发生的频率”的回答为评分标准,涉及问题包括N401—N403、N405—N407、N409—N411、N413—N415、N417—N420等16个,计算16个问题的总得分来衡量居民的消极情绪水平。

③ 治安环境使用调查问卷中对“请问您所住小区周边治安情况如何”的回答来衡量,从很差到很好分别赋值为1-5。政府治理绩效使用调查问卷中对“您对去年本县/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是”的回答来衡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

安水平和政府治理绩效。列(4)和(5)的估计结果表明,居民所在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上升都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且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上述两变量后,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和显著性都有所下降。综上所述,黑恶势力通过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机制确实存在。

表3 黑恶势力降低居民未来预期和心理健康的传导机制检验

	(1) 居民生活满意度	(2) 对未来的信心	(3) 消极情绪	(4) 居民生活满意度	(5) 居民生活满意度
黑恶势力	-0.0107** (-0.0046)	-0.1370*** (0.0360)	0.0321*** (0.0040)	-0.0193* (0.0111)	-0.0028 (0.0110)
对未来的信心				0.6033*** (0.0087)	
消极情绪					-0.2432*** (0.016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0072	30035	30078	30034	30072

注:表中列(1)(4)(5)汇报了使用Oprobit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列(2)和(3)汇报了使用OLS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4 黑恶势力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传导机制检验

	(1) 居民生活满意度	(2) 治安环境	(3) 政府治理绩效	(4) 居民生活满意度	(5) 居民生活满意度
黑恶势力	-0.0107** (-0.0046)	-0.1186*** (0.0109)	-0.0236** (0.0111)	-0.0061 (0.0111)	-0.0065** (0.0031)
治安环境				0.1827*** (0.0075)	
政府治理绩效					0.1685*** (0.00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0072	30045	29383	30034	29379

注:表中列(1)一(5)汇报了使用Oprobit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五)异质性分析^①

1. 区域特征异质性检验。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都存在较大差异。相应地,不同地区黑恶势力的存在条件和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分析整体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状况、法治环境和公共安全投入等四个维度出发,检验不同环境下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各省人均GDP衡量,人力资本使用各省加权平均的受教育年限测度,法治环境使用樊纲等编制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来衡量^②,公共安全投入使用各省当年人均公共安全财政支出来衡量,并以各指标中位数为界进行分组回归。从各组估计结果来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较低地区、法治不完善地区、公

① 该实证结果限于篇幅不作展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②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

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负效应更大。因此,在扫黑除恶过程中,应该将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较低地区、法治不完善地区、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同时,从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角度来看,加快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完善法治环境、增加公共安全投入是优化社会治安环境的治本之策。

2. 个体特征异质性检验。除区域差异外,个体差异也会使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在个体差异方面,本文从城乡、收入和教育等三个维度检验黑恶势力对不同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居民居住地为依据,将样本划分为城镇分组和农村分组;以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依据,选取收入最高的25%为高收入组,收入最低的25%为低收入组;以居民受教育年限为依据,选取大专及以下样本为低学历组,本科及以上学历样本为高学历组。结果显示,黑恶势力对各类特征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为负,但仅对农村居民、低收入居民和低学历居民的边际效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黑恶势力给农村居民、低收入居民和低学历居民带来的福利损失更严重。因此,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重视提高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群体的福利水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五、结论与启示

黑恶势力作为和谐社会的巨大毒瘤,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提出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2020年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黑恶势力得到根本遏制,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地区黑恶势力严重程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效应,且该结果在控制各类干扰因素和排除潜在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依旧稳健。通过传导机制检验发现,地区黑恶势力会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心理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等路径,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通过对不同地区和个体特征分组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较低地区、法治基础薄弱地区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给农村居民、低收入居民和低学历居民带来的福利损失更严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治理原则,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扫黑除恶是净化社会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方式。但随着扫黑除恶三年专项行动的结束,黑恶势力依然存在复发的可能性。因此,要积极构建打击社会黑恶势力的长效机制,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立健全源头治理机制,形成打早打小的治理模式。完善督导督办和考核激励的组织体系,形成打击黑恶势力的持久动力。(2)坚持以发展促和谐的治理思路,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要从根本上消除黑恶势力的影响,必须坚持以发展促和谐的治理思路,通过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促进劳动力正规就业、营造社会法治环境等方式,降低居民从事非法活动的动机,增加其违法成本,压制黑恶势力的活动空间,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注重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感受。社会治理失效的受害者更多是低收入、低学历的社会弱势群体。而失效的社会治理又会进一步阻碍社会弱势群体能力的提升,减少居民的发展机会,形成贫困陷阱,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抑制社会阶层流动,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大隐患。因此,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坚持以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福利水平为导向,不断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The Welfare Effect of the Crackdown on Gang Crim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Life Satisfaction

Liu Changgeng^{1,2} Wang Yuhang² Peng Qianrui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P.R.China;

2. Business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P.R.China)

Abstract: In January 2018,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the State Council decided to carry out a three-year national project fighting against gang crimes. The project was regarded as a major political mission, placed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and was enlisted in the key agenda. It aims to ensure that people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happiness, the society is in order, the country maintains stability, and the Party's governance foundation is further consolidated. Since 2018, a total of 149,000 arrests and 230,000 prosecutions involving gang crimes have been approved around the country, among which 54,000 suspects have been prosecuted for organizing, lea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gang crim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rackdowns on gang crimes on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Restrict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number of suspects prosecuted for gang crimes per 10,000 people as a measure of the severity of gang crimes in each province before the policy by manually compiling the work reports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in 31 provinces from 2018 to 2020.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6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social gang crimes before the policy on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us the social welfare effects of the crackdown on gang crimes are identified with a reversed approach.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Gang crimes significantly reduce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in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f the regional gang crimes on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indicate that for every increase of one person per 10,000 people involved in gang crimes, the probability that residents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ir own lives decreases by 2.46 percentage points.

(2) The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value,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governance level are the important aspects which gang crimes impact on thus influencing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gang crime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on residents'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income level, future expectations,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dicating that regional gang crimes can reduce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on the above mentioned aspects.

(3) There is significant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in the social welfare effects of the crackdown on gang cr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gang crimes are greater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regions with lower human capital, regions where rule of law is under-developed, and regions with lower public safety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groups, gang crimes bring more serious welfare losses to rural residents, low-income residents, and under-educated residents.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effortfully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crack down gang crimes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improvement on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fare.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governance concept of promoting harmony through development, fundamentally eradicating the root of gang crimes. Third,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welfare feelings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society.

Keywords: Crackdown on gang crimes; Resident welfare; Gang crimes; Life satisfaction

[责任编辑:纪小乐]